

ZHONGGUODANGDAI
ZUOJIA
MIANMIANGUAN

林建法 选编

下

再度漂流

中国 当代作家

寻找家园融入野地

面面观

时代文艺出版社

ZHONGGUODANGDAI
ZUOJIA
MIANMIANGUAN

林建法 选编

下

再度漂流

中国 当代作家

寻找家园融入野地

面面观

时代文艺出版社

关于王蒙的弯弯绕

张 宇

应该写一篇王蒙印象记。怎奈我对印象这种文章有偏见，总觉得“印”一个人就像印一面镜子，怎么印也印不进去。更别想接近本质。印来印去最后印得还是你自己。不如干脆说自己的话，只拿对象做载体，倒老实些。

后来我想把题目叫《侃王蒙》。王蒙太能侃，老侃别人，他也该有人侃一侃。平常我们两个见面曾对着侃，我也自信能侃出别味来。又想到如今卖弄幽默的文章太多，大都成了卖笑。实在不想与他人为伍。我虽不富，还不到卖笑挣钱的地步。还是有啥说啥，绕着王蒙说些闲话。这么一想，我感到了轻松。

1

王蒙最大的毛病，就是他当文化部长以后，没有把笔停下来，专门儿当官儿。中国的文化人，写文章做艺术，没有纯粹的传统和习惯。一般来说，都把它作为跳板跳进仕途。俗话叫敲门

砖，这句话有失优雅。从古到今，大多数人都认为，只有当官才能为民族为国家为百姓更好地服务，当然也包括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如果王蒙不再写文章，只传达上级精神，把智慧和精力用在落实政策上，把剩余的精力闲着，别人就不会知道他想什么和怎么想。想什么不重要，共产党人还能想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怎么想，怎么想是一种思维形式，形式的改变自然会产生思想。或者说形式本身就是思维的内容的反映。一个人老有新思想，就会让别人不舒服。如果不写文章，就容易保护自己。再加上他从小参加革命的经历和资本，满可以把官再做大些。

纵观王蒙所有的作品，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思想问题。无论他在艺术上如何探索，在形式上走多远，在叙述上再陡峭，语流再湿润和节奏感和音乐感，语码再严密和难解，在这些文字下边永远跳动着一颗共产党人的心脏。由于他从小参加革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童子军，练过革命的童子功一样，作品中无处不闪射着对社会对人民命运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的光芒。这使他虽然跳脱出老一代作家的审美模式和表现习惯，文字所传达的情感都不免有点热。说有点躁气不准确，也不好听。他是我的师长，我不能这么说他。他似乎对文学赋予了太宏大又功利的功能，急于让文学迅速为人民创造精神财富一样，这使他进入艺术化境之后，在这个高境界里行进的很苦涩。已经造成为世界影响的作家，却只能够独立风格无力于耸起高峰。而从阅历和天才，索性说人格精神，他是应该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给我们中华民族挣来自豪的。我常常对他寄予无边无际的仰望。我们中华民族有过古老的辉煌文化，也应该有现代的崭新的辉煌燃烧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党和政府让他辞去部长当作家，真是有远见卓识。我甚至觉得有点高瞻远瞩的

味道。

退回来，仅仅拿他当部长来说，他边当部长边做艺术，实在是一种毛病。消耗他的精力和心智影响身体健康不说，他这么做该伤害了多少人的自尊，甚至给过多少人无穷无尽的一种屈辱。

我不知外国作家和国外的作家群是什么结构是怎样一种生存状态，由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一直没出过国也没要求出过国，于是只知道中国情况。从我当作家以后的体会来体会，我片面地认为，我们文坛上正处于艺术创造旺盛期的作家们是群众，是中国文学的基础。既然是基础，就处于文学楼房的最低层。这种情况好像永远也不可改变一样，也从来没看到过改变的迹象。这些人是文学的生产力，也是文学的希望和未来。

再往上数，在这个基础之上，是一批写着写着写不太顺当的作家。干脆说才华泄尽也没有什么关系，谁都有才华泄尽的时候。这些人由于在艺术上失去了信心，便开始在艺术之外的官场和钱场下功夫。拐回头对基础们超越和潇洒一般，表现出一种过来人的世故和成熟。自然就觉得比基础们高人一等。于是，他们开始教导文学青年如何写作，给人家指出一条条作家之路。对上边开始无比尊敬，向上边广告自己的作家荣誉，又拐回头对作家们广告自己在上边拣来的好处。到处可见他们的聪明智慧，就像飘在空中的灰尘。他们把成就和才华一件件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给人家看，大有要和阳光比灿烂的派头。

如果写着写着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就当作家的领导人。大会小会以著名作家加领导的双料厚重身份做报告，坐主席台上坚持着长时间不跑厕所。对上边，以专家学者自居，对下边又以领导和权威自居，来回着自居，很忙也很幸福。这些人掌

握着安排作家们生活环境的权力,叫你住房你才能有房住,给你评什么职称你都要接着没话说没理讲。不听他们的话,就是不听组织的话,也就是不听党的话。因为他们什么也不会写了,就成了专家的专家。作家发表作品,他们到处发表名字和形象。听他们谈话,几乎都一样,用作家的口气来重复政策的精神,他不说别人也知道。他们在传达上级精神时结合本单位实际,从来不发明创造。由于不发明创造,就不犯错误。他们深知只要你开展工作就会有犯错误的机会和可能,只有不工作才不犯错误。由于不错误,他们就永远正确,就可以把官再做大。一般来说,具体指导作家们怎么写作,什么是无产阶级艺术什么是资产阶级艺术,都先由他们发现并给予否定和肯定。因为不生产的人,才能批评生产力,这是一个无形的规律。你生产作品,他生产批评。就这么回事。不知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信。

再往上数,就到了文学楼房的高层,一些早年间曾发表过作品的人,如今连汉字也摆弄不顺当了,甚至丧失了说话能力,只会讲别人的话,不会讲自己的话。这些人就来掌握作家们的命运。参加活动和讲话,都要产生象征和意义,像刮风下雨。这些人左右着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左的刮左风,右的刮右风。反正不能叫文坛安安生生生产作品。现在可好了,左的左不动了,右的也右不动了。急得他们左右对着闹。所以我说,文学失去和排除了左右干扰以后,可能会出现好时光了。

我说的这种体会和看法,当然是个别现象,没有普遍性,顶多叫个别的普遍现象。虽然语句不通顺,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我这绕出去说说,再弯回来说王蒙,就明白了他的毛病的影响。当部长已经是头头,还写那么多作品,就揭穿了别人的

西洋镜。这就使许多只会当头头不再会写作品的人蒙受打击，无比难堪和屈辱。这整整伤害了一帮人哪！这些被伤害和污辱的人，也不会闲着。不会发表作品，他会发表情绪。发表情绪又不用写又不用说，容易得很。这就使不少人拐回头拿王蒙来练身手，由于这个靶子好，怎么练都不失去什么只能得到什么，练的人就多也越练越有劲头。王蒙要么当作家，要么当部长，你什么都当，还叫别人活不活了？这么一说，王蒙辞去部长专门当作家，是必然的结局。

我自己认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这几种人并存，文坛才显得多结构多元化的丰富。作家的使命是写作，你就全身心投入创作，这是艺术创造，也是人生的一种形式。你要当官你就放笔去钻营，也没有人挡你。官总是要有人来当的，你不要当，就要别人来当。不要自己不当，别人当着，又看不顺。那就太多事。人家什么也不会干，你不叫他去当官，你叫他去干啥，你叫他去自杀？他如果有自杀那样的大手笔，他也就不去当官了。怎么活都是活，怎么都为人民服务，都要互相理解，互相团结。

2

无论从年龄结构，或者是从艺术修养说，王蒙实在要算我的师长。他总称我为朋友，甚至写信时叫我老弟长短。我知道一为自谦，二为亲切。这就放纵了我的无知和狂妄，自己写不好作品，评论师长的作品出言却狠，毫不留情面，不论准确是否。我这人喜欢真实。也知道真实不容易。但对王蒙，我只有真实。

说实话，王蒙的作品确实写得好。有些佳作名篇使我从心

眼儿叹服。但也不是篇篇都是名作，有些作品在艺术上也不无随意和粗糙。如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要说也算不错的作品，但放在王蒙的作品中，实在算不上上乘之作。再说难听些，不说比他自己的佳作相比而不如，就比我的偶尔写顺当的作品，也不好到哪里去。我自信我的上品比他这些随意之作，实在要好。但是奇怪，咱们写得很好，也没有什么影响，而王蒙的这些即兴随意之作，却能产生这么大的轰动效应。从这篇作品问世到现在，评论文章一直不断，好像无穷无尽取之不竭用之不完一样。

据我知道，这一个区区小短篇，在国内转载得奖入选集，已经得到太多的稿酬。又让外国人翻译介绍，挣到了美元、法郎、日元等。这真是不公平，又是现实的存在。我有时就想，咱都是写小说的，王蒙怎么这么幸运呢？难道这里有什么秘密，有作品之外的功夫？

后来我终于明白，大量的评论文章和文坛信息源源不断涌过来，我把这些综合分析以后，发现了一个秘密，王蒙的文章不仅写得好，而且人家有托儿，这个“托儿”是北京流行的口语，形象传神精练的凝练出吹鼓手和捧场的人的个性和功能。我怀疑这个新词语源自老北京京剧场的票友。我这才发现，在文坛混，不仅要写，还要由托儿来托出来。你写出作品，只能像编剧那样先写出了剧本，还要经过导演和演员一般的托儿们来二度创作，才能丰富和不断丰富你的作品，才能使你的作品托成佳作名篇。原来是否佳作名篇的标准并不掌握在作家和读者心里，而是掌握在托儿们手里。

时代不同了，什么都有发展和创作发明，旧时代京戏的票友，无论唱得好坏，只管拍手叫好。如今的托儿们，否定了旧传统习惯，如果想把一部作品托出来，不再像过去的票友们那样

去叫好，而是独出心裁，开始拼命地批评批判和否定。阅读有逆反心理，被托儿们研究透了，他们知道想捧王蒙，只有打击和批判王蒙，才能把他托出来。于是，从一开始就批判，一批判就引起了轰动。并且托儿一家伙还不够，看看浪潮要落，就再次掀起风浪。就这么一再地批判一再地托儿，不仅把这篇小说托到了全国各地，上中央下地方，又托儿到了外国，真是把一篇文章反复做，做到了家。托儿到后来，连一向以说真实见长而权威的老作家，由于受到托儿们的影响，竟然也说王蒙的《坚硬的稀粥》是世界名著。

试想，如果不是这些才华横溢又追求执著的托儿们的艰苦不懈地努力，王蒙这篇《坚硬的稀粥》会有这成就和影响吗？

由托儿这个词，我想到了流行在生意场上的一个新词叫做大。本来嘛，你大就大，小就小，怎么可以把小做成大呢？而如今生意场上为了竞争市场，就专门来做大。好像大不是原来的大，是经过做才大了起来。当我亲眼看见做大的过程和效果，我才真从心里叫服。这使我联想到，文坛的托儿和做大是一样的意思。

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我从心里嫉妒王蒙甚至发展到一种仇恨，文坛怎么这般不公平，咱就怎么也弄不来找不着托儿呢？后来又想到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有人就有拥托儿的命，咱就没有拥托儿的福，也就不嫉妒了，把这解释成一种缘份。也就是说，人家王蒙天生命里有托儿的，托儿是找不着的，是早就注定的。

据我知道，王蒙的这些托儿，和旧京戏的票友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这些托儿从不计较什么好处，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的义务。不能不使人想到，到底是新时代不能和旧时代比，给人做好事，不要名不要利，这不是雷锋精神是什么！

出于这种感慨，不久前见到王蒙时，我就说他太小气。他的作品挣那么多美元日元人民币，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劳动，应该给托儿们分一点儿。不分多，也应该少分一点意思意思。如今干什么事都讲究提留和手续费，起码他应该付广告费。说句再小气的话，现在的托儿不为名利，也要请人家吃顿饭喝杯酒，略表心意。挣那么多钱，自己一个人用着，心里不是滋味。怎奈王蒙说，找不到人呢？就是要感谢，也不知道人家同意不同意，肯不肯赏脸。再一个，人家托你，没有功利目的，完全是大公无私，你一表示，不就染脏了人家了吗？说到底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后来我想了许多，终于我把这个问题想翻了。我先想那曹雪芹的《红楼梦》，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有多少代多少人托它？国内外这么多托儿，别说曹雪芹死了，就是他活着，他的生活还没着落，拿什么来表达心意报答这些托儿呢？接着我又反过来想。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常常管不牢自己思维的疯狗。这么多人托《红楼梦》，通过托《红楼梦》而先找到饭吃又找到酒喝，挣了无数的钱，得到了无数的好处，倒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养活了一代又一代的吃客。这么一想，托儿们不是托《红楼梦》，而是托自己的饭碗。反而是曹雪芹把他们这些托儿托了起来。这么比较一番，王蒙的作品虽不如曹雪芹养活人多，毕竟也养活了一批托儿们。自己搞创作，还养活这么多人吃饭，王蒙真是个好同志。真是一个人富不算富，还要带领别人一块富。王蒙不愧为一个从小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哪。

你看，现实就是如此嘛，通过批判他的作品，有人捞到了政治资本投资于官场或派场扩大了再生产能力。有人捞到了思想觉悟取得一直要取得的那种人的信任，时间是金钱，观念更新看信任也是金钱哪。再不值的，最少也发表了学术性论

文，可以拿它去评职称，捞稿酬就是表面的浅薄收入了。这么一看，我倒觉得，王蒙不仅不要请他们吃饭，这些托儿们还要请王蒙喝酒。我甚至觉得，他们挣来的好处和金钱，应该给王蒙提成留款。只有这样才公平呢。

当然，如果不闹矛盾，说句和气话，为了团结，谁也不给谁提成才好。也不论谁托谁，托来托去，都在文坛做事，目标一致，都是为了精神文明建设，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还是不宜争论这种关系为好。只说存在这种关系，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点要考虑，作家们写出作品，有人来托儿，什么评奖和批评，从正反两方面来广告和宣传作家和作品，扩大影响。作家们也要有表示，虽不表示金钱，要表示友谊和信任。那么我建议文坛将来要设一个托儿奖，谁会托，托出了重大成就，也不能淹没人，要重奖这种科研成果。没有评奖之前，主要作家个人要有行动来谢托儿。这也是互相团结互相尊重的办法。像王蒙这种人，就要首先带头谢托儿。这样形成一个习惯和风气，也算一种民意测验，也给以后的评托儿的大奖造些舆论打下坚实而浑厚的基础。

写到这里，由王蒙的托儿绕出这么多废话，隐隐使人感到一种悲哀。写小说十几年，由于不懂得找托儿，苦苦使自己不能够做大。现在才明白了艺术的真谛原来是找托儿。怎么办？自己没有，只能先借人家的用。我准备下次进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找王蒙借托儿。见面多叫几句老师，不妨脱出真实，索性虚伪做作一些，不再吃王蒙的饭喝王老师的酒，干脆去时背一袋河南红薯去送礼，叫我敬爱的无比敬爱的王老师给我借几个托儿。那样，我就当大作家了。这么一说，我是否也成了王蒙的、王蒙也成了我的托儿？

王蒙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当文化部长以后，没有把笔停下来。不仅没有停下来，而且越写得越多，越写得好。这种双重表演赤裸给人们的是一种王蒙全部风景的接近和展览。

我曾在悠闲时做过一个游戏，把自己的意识和思维分成理性和感觉两组，又把这两组细分，我吃惊地发现一个人可以分化成许多个人一般。一天夜里，我分别沿着分化出来的思维形式写同一题目的小文章，写完六篇后，我发现这六篇文章从语流到结构独立成风格，活活是六个人一般。从那以后，我对艺术家有了新的理解。

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只突出表现一种主要思维形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形成自己的风格之类。一种风格就像一种乐器演奏出来的音乐，大家放在一起，形成了文学的混合交响乐。中国的现当代文学有一个习惯，容易一种风格涌出一拨一拨的作家群体。我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起码简化了文学的丰富性。如果这个荒唐的看法和认识还有一点意思的话，顺着我自己的思路，我早就觉得王蒙的文学现象是一个特别的，他是一个人一部交响乐。

他的浪漫和诗情，使他写出了比年轻作家更早更现代的作品系列。这系列作品中，语码的密度，节奏的跳跃，音韵的丰富，使时间和空间打碎，搅和在他生命意识体验的溪水里，翻卷着奇异的浪花，鸣响着新奇的声响。无疑这是王蒙对新时期文学最突出的贡献。

他的幽默和机敏，使他写出了风格别致的幽默系列作品。这些作品的语流光滑而苦涩，使汉字变成一颗颗滑溜溜的药

丸一样，吞读容易，品味却淡淡地苦。如果读出悟性，越过文字的山山水水，能一直苦到心灵深处。

他的生活经历的形而下体验，又实实在在地组成了一系列比传统现实主义更传统更现实的系列作品。只读这些作品，你会体会到他的比任何人的平常和朴实。叙述的缓缓道来，章法的老实传统，传达的实在，你会永远感到一颗跳动的平常心脏。

他的理性和严密的逻辑，又使他写出了那么多理论文字。他的理论文字，常常越过对象文字表现的表层，把文字和对象一块端出来审美或者审丑。竟发展到后来写出了一本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令世人瞠目结舌。但无论他如何理论，无论他理论古今哪一位作家，完全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观照，无处不咏叹着现代进行时的感慨和叹息。这使他的理论文字，甚至他的杂文和随笔之类，时时越过文体界线，给人一种新鲜的强烈的读物感。

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书法。有幸看他给人家写条幅和招牌，那运笔的认真，那神态的潇洒，那笔锋的笨拙，那书法的童趣，那整个书法作品的低下不成体统，活脱脱赤裸出王蒙内心深处无边无际的善良和质朴。写完后自己又嘲笑自己，早知道如今要给人题字，从小应该练练毛笔字才好。这话语的幽默和调侃，连对自己也不放过。

但是，这几种文字表现形式只形成了他文字世界，还不是交响乐的全部。王蒙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的生活传达，尤其令人叹服的是他的部长之行。好像有一个极限，任何作家的作品，比起他自己的实在生活来，都越不过那种本质的丰富和生命的质量。我有时就想，王蒙当文化部长时，很像进入审美，叙述一种文体。开篇的脱俗，内容的丰厚，结尾处的大处落笔。简

直是一部名著。两相比较，他的文字比起他本人的生命过程，实在是没有超越。

艺术家走到极限，好像是这样一种状态，他生活在文字中，文字本身就是他的生命本身。他的审美又进行在生活中，生活本身就是他的艺术世界。两相融会，到后来竟分不出他是在生活，他还是在艺术创造。整个的审美活动和创造性劳动耗干了生命的灯油，把肉体蛀空成个报废的壳子，把肉身还给大地，使精神进入永恒。我不知这混说八道有无道理，仅仅是对艺术和艺术家的一种认识和感悟。

如果这么说，王蒙还没有走到极限。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也作为一个他的学生，也作为一个小老弟，我多么希望看到王蒙的极限风景的灿烂啊！

于是，为了帮助王蒙完成他的艺术世界，靠他自己的创造之外，他的托儿们也任重道远肩负重担，可不能休息呀。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努力努力再努力，不仅把王蒙大写在文学史上，也悄悄在旁边给自己留下一个补白的地方。

1992年12月28日郑州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

陆文夫与他那“锁着的箱子”

章品镇

陆文夫的小说，在 50 年代就颇有点名气。但是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此人不大开口，沉默寡言。所以有人替他取了个绰号，叫“锁着的箱子”，这个名字是颇有点危险性的。数十年后曾经有人用铁棒把箱盖撬开，只见箱徒四壁，颇为失望。用显微镜检查的结果也只有一般的“流毒”，并无炸药与鸦片。可是，如果让陆文夫自动启箱，却会给你以一种阿里巴巴式的惊喜。我与他相交三十年，经常看到他自动启箱，特别是当三杯老酒灌进那钥匙孔之后，他也会滔滔得口没遮拦。

不久前他对我谈过这样一段话：大城市里那繁忙纷纭的生活很难造就大作家，因为人与人交接的密度有如北京大栅栏、上海南京路，无一刻时间能使你安下心来。我认为：造就一个作家的条件，生活、读书以外，还得让他有个思考问题的环境，即使处在动乱之中，也要能动中取静。总之在生活历程中要将许多人聚成一堆给他看，也要单独将一个人放在他的面前毫无干

扰地让他仔细端详，还得由他像牛一样地静静缓缓地反刍，所以说要有一个有时甚至是孤独的环境。陆文夫就有一个与许多熟人不同的在泰兴乡下的老家。这个家庭除给了他那样的环境以外，有决定性的是让他用二十年的时间看了“一百年”的风景。我的许多同辈好友，有的身处时代怒涛的浪头，有的追随大流前进——初中时期在“一二·九”的游行队伍里跟在大哥哥、大姊姊们的后面摇旗呐喊。那时的陆文夫还几乎是在鸦片战争前的乡村私塾里读《千家诗》哩。我们这个民族本是一锅平静的水，可是帝国主义不停地在锅下增加干柴烈火，他们不晓得同时积累的是要求救亡的能量，锅里的水到了沸点会掀盖而出，发生质的变化，孔孟门墙再也圈不住这一辈人了。何况是陆文夫这样的人物。在同样的潮流中，我是竞走，他则是三级跳运动员。在时间上本远远落在我的后面，这时带着比我广阔得多的空间的知识，几跳几跳，跳到我的前面去了。陆文夫写得最好的不是新人新事，而是老人新事：徐文霞、葛增先、周泰、汪昌平、朱源达、唐巧娣、朱自冶等等皆是。年纪轻轻，岂仅是“三朝元老”，从孔孟到马列，“阅人多矣”。造成这情况的原因直接来自他的家庭。

任何伟人的童年，不论多么平凡的亲长，对他来说都是无上的权威。“天地君亲师”，亲是在师之上的。一旦积累了相当的世途风霜，书本知识，才取得把他们放在合理位置上的能力。

陆文夫童年、少年一直跟着祖母，善良的祖母捂暖了他的童心，彼此又是诉说的惟一对象。稍识几个字后，祖母叫他到庙会上去买来那类用红绿有光纸作封面的“唱本”，读给她听。都是些劝世文，里面隐约可见关汉卿一类人物的思想遗风，老太太和小孙子读着听着，双双掉泪。六七岁的幼小的心灵，就

在人生的苦汁中浸了一下。1979年他写《献身》时，就常常有“唱本”里的两句话，在他脑子里盘旋：“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分飞。”他是深深感到某些具有现实主义传统的民间文学的力量的。50年代，他的作品语言，很明显是学生腔。但从《葛师父》时期开始，语言有了变化，注意从群众生活中来，读来亲切感显著增加，有时还无意间用上了韵，这是“唱本”从记忆深处泛起的表现。还有后来夹港，那个小集镇上有个开茶馆的说大书：“三国”、“岳传”等等。因为是口传的评话，日常用语就多了，而且是经过提炼的。另外，祖父的说话极富表现力，而且声调铿锵，自小屏息静气听他发议论、骂人。实际上也就在学习运用语言的艺术。待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的父亲对他便另眼相待了，这位老先生让大儿子走他自己的路，被送往上海四马路去学徒。随着他的事业发展、交游广阔，便希望二儿子学而优则仕了，于是老陆便入了私塾去。读《千字文》、《千家诗》，直读到《论语》、《孟子》、《史记》。后来的一位业师还竟相当“自由主义”。学生看“闲书”，他不认为荒废学业。当然，他还是有界限，“淫书”如《红楼梦》例在取缔之列。当时能租读到的书有《三国》、《水浒》、《精忠岳传》、《七侠五义》，也有公案书。住读的学生仅两个，特别夏夜乘凉师徒三位势必要在课堂以外聚首。在这种场合，先生竟情不自禁常以“闲书”为话题，这时他给学生智慧的启发，大大超过了引导“人之初，性本善”的朗读。不知从那里飞来的一篇描写沈阳沦陷的小说，竟使老陆读得潸然泪下，为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作了铺垫。又不知是什么因缘，朱自清闯进了他的私塾生活，《荷塘月色》细腻、清新地再现了陆文夫已经为之沉潜动心的生活，文字的流畅、优美，使当时还不能理解太史公的少年陆文夫心眼大开，天下竟有此等文章，他的易于接近文学的秉赋，使他与现代文学一